

# 旅行、獵奇與懷古 ——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

李嘉瑜\*

## 提 要

本文以日本漢詩人久保天隨（くぼ てんずい，1875-1934）的《澎湖游草》為討論主軸，關注的焦點在久保天隨於漢詩中如何想像與闡述澎湖。經驗性地來說，「澎湖」是一具體的空間存在，而文本對於「澎湖」的書寫，則屬於空間的再現，因為「再現」，所以涉及書寫者在作品構型過程中的剪輯與詮釋，書寫者從各自的視域「書寫澎湖」，標示行走軌跡，形塑地景圖象，也賦予「澎湖」不同的意義。《澎湖游草》是書寫澎湖的諸多文本之一，久保天隨遊訪澎湖的目的為何？他屢履所及的國境之南，在殖民母國強行進駐後，這邊陸的地景曾出現怎樣的改造與變化？而旅者久保天隨是如何凝視這個南方島嶼？透過文本的分析，我們試圖標記的是昭和7年（1932）詩人在詩中所琢磨的澎湖圖象。

關鍵詞：漢詩、日本漢詩人、久保天隨、澎湖游草、澎湖書寫

---

\*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 Travel, Exoticism and Archaism: Peng Hui in Kubo Tenzui's Chinese Poetry

Lee Chia-Yu

Associate Professo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Japanese Sinologist Kubo Tenzui (1875-1934) imagined and portrayed Peng Hui in his work - Peng Hui Travelogue. Experientially speaking, Peng Hui is a real space. However, in his work, he recreated the space (the scenery of Peng Hui) in terms of his own sights and viewpoints. During his journey there, Mr. Kubo took down his routes and draw down the pictures of Peng Hui. Thus, we can now see his very distinct description of Peng Hui.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aimed to explore why Kubo Tenzui traveled Peng Hui, how the landscape transferred after the Japanese reign as well as how the Sinologist viewed this Southern island. All the depiction is based on Kubo Tenzui's writing in 1932.

**Keywords: Chinese Poetry, Japanese Sinologist, Kubo Tenzui, Peng-Hue's Travelogue, Peng-Hue Writing**

# 旅行、獵奇與懷古 ——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

李嘉瑜

## 一、前言

日治時期來臺的日本漢詩人及其漢詩，就廣義而言，應屬臺灣文學的一環<sup>1</sup>。而在當時來臺的漢詩人中，久保天隨（くぼ てんずい，1875-1934）無疑是其中極具

---

<sup>1</sup> 現今臺灣學術界所使用的「臺灣文學」一詞，可分廣義、狹義二者。廣義者，如莊萬壽、陳萬益、施懿琳、陳建忠編撰《臺灣的文學》，（臺北：允晨出版社，2004），頁 9，「所謂臺灣文學是：臺灣這個島嶼所產生的文學。它是由出生或曾經居住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以臺灣地區使用的語文來創作的文學」，此一定義中，「出生或曾經居住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指涉的對象包括「數千年前，先後來臺屬於南島語系的波里尼西亞民族（今原住民）；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後，前來臺灣的閩粵地區的福佬人和客家人、荷治時期的荷蘭人（1624-1661）、清治時期的滿人（1661-1895）、日治時期的日本人（1895-1945），乃至戰後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中國人（1945-）」；而所謂的「臺灣地區使用的語文」指涉的是「臺灣各族原住民所使用的母語，早期來臺漢人慣用的福佬話、客家話，日本統治時期的日本語以及戰後來臺的中國人所使用的中國話（北京話）」。趙天儀，《臺灣文學的周邊—臺灣文學予臺灣現代詩的對流》，（臺北：富春文化公司，2000），頁 16，亦言「我以為臺灣文學的多元化，除了臺語文學以外，應容納其他語文寫成的臺灣文學，因為這些都是歷史自然演變形成的，我們無法排除」。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對此也有相近的看法，其《臺灣文學這一百年》，（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22，「無論是日語或北京語，只要該文本（text）是和臺灣等身大的共同體意識，或和所謂的臺灣民族主義的價值判斷有所關連，就可以稱為臺灣文學」。狹義者則多以地域、民族或語言來區分，如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15，「臺灣文學是臺灣人的文學」；林宗源〈臺語文學就是臺灣文學〉，《民眾日報·臺語文學特刊》1992 年 1 月 20 日，「臺灣儂凡是用唔是個的族羣的母語來寫，一定無算是臺灣文學。道理真簡單，有啥物款的儂則有啥物款的語言，有啥物款的語言則有啥物款的文化及文學」。筆者以為廣義者較能涵括「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狹義者以地域、民族或語言來區分，將排除許多對臺灣文學影響深遠的歷史經驗以及其影響下所產生的特殊性。所以本文對於「臺灣文學」一詞採用廣義，由此日治時期來臺的漢詩人及其漢詩則應被列為臺灣文學的一環。但正如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2006 年 11 月，頁 41，所指出的「目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很少留意日本漢詩人在臺的情況」，所以這一領域仍待學者投入與研析。

研究價值者之一。首先，就漢詩評價而言，久保天隨在大正（1912-1926）、昭和前期（1926-1945）的日本漢詩壇，「詩名列國分青厓、岩溪裳川之后，聲譽頗高」<sup>2</sup>，是日本詩壇具指標意義的漢詩人。其次，就與臺灣的關係而言，久保天隨在昭和3年（1928）2月底曾來臺旅遊<sup>3</sup>，此行會晤了多位日籍與臺籍的漢詩人，並賦有多篇漢詩記行<sup>4</sup>。昭和4年（1929）久保天隨開始擔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在臺任教期間，與臺灣漢詩愛好者，共同成立「南雅社」，除了日籍漢詩人外，他與臺籍漢詩人亦多有往來<sup>5</sup>，並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等報刊

<sup>2</sup>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頁182。

<sup>3</sup> 久保天隨此行的目的是收集臺灣史料，《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29日，報導「內地詩人久保天隨先生二十七日來臺」，同年3月1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內地文學家，久保天隨翁二十九日自臺北出發，赴中南部視察。預定三月十三日歸北。然後乘十六日便輪歸還內地」。事實上，久保天隨此行亦有憑弔父親行跡之意。《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年6月3日，「父君讓次氏は明治三十年から三十二年頃まで臺東廳の屬として勤してゐた」，可知他的父親久保讓次在明治三十年至明治三十二年間曾於臺東廳任職，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頁48，亦指出「久保天隨之先考讓次先生，於明治三十年（1897）到明治三十四年（1901）（案：此時間似有誤）任臺東廳屬。尾崎古村詩賦贈曰：『九泉應有喜，孝子遠來過。緣此名知本，令君感慨多』」。

<sup>4</sup> 在久保天隨的《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東京：久保舜一印行，1938）中，卷十六的紀年是戊辰，亦即昭和3年（1928），其中〈江山樓小集席上，賦似謝雪漁、魏潤菴諸君〉、〈天籟、尾崎古村諸君〉、〈分濃春煙景似殘秋，予得景字〉、〈瑞竹三章〉、〈板橋別墅，賦似李讚生郡守〉、〈留別臺北諸友〉、〈偶詠〉等應爲此行之作。可知在此行中，他已結識臺北「瀛社」的謝雪漁（汝銓）、魏潤菴（清德），並會晤了日籍友人尾崎古村（秀真）、小松天籟（吉久）。而在臺籍詩人中，久保天隨與謝雪漁、魏潤菴往來密切，除了詩文贈答外，謝雪漁曾翻譯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在明治40年（1907）7月18日至明治41年（1908）3月19日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三版。魏潤菴則在久保天隨辭世後，在昭和9年（1934）6月7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發表〈哭天隨博士〉十首悼念亡友。

<sup>5</sup> 在久保天隨的《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東京：久保舜一印行，1938）中，可以發現與他有往來的臺籍漢詩人，不僅限於昭和3年（1928）來臺結識的魏潤菴與謝雪漁，此集的〈疊韻酬楊笑儂〉（卷17，頁8下）、〈次韻酬楊笑儂〉（卷18，頁4上）是與彰化「應社」的楊笑儂（樹德）酬唱。而楊笑儂在昭和6年（1931）4月26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亦有〈呈久保天隨先生〉二首；昭和9年（1934）6月19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十二版，有〈哭天隨博士〉。〈題王友竹遺稿〉（卷17，頁31上）是爲昭和5年（1930）過世的新竹詩人王松（友竹）的遺稿題詩。〈送王雲滄〉（卷17，頁11下），則是爲「瀛社」的王雲滄所作。鹿港「鹿苑吟社」的施梅樵在昭和6年（1931）4月27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有〈贈久保天隨博士〉；昭和9年（1934）6月2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十二版，有〈輓天隨博士〉。除此之外，久保天隨還爲昭和7年（1932）臺灣的全島詩人大會的作品集《瀛洲詩集》寫序，並言「予曩昔受招邀，而以病不能出」，可知其亦曾受邀參加當年的全島詩人大會。

發表漢詩。從昭和4年（1929）來臺至昭和9年（1934）於臺北自宅過世<sup>6</sup>，久保天隨寓臺期間的漢詩多收入《秋碧吟廬詩鈔·戊籤》；「南雅社」的課題之作收入《南雅集》；昭和5年（1930）由臺灣赴中國福建旅遊的漢詩，輯為《閩中游草》；昭和7年（1932）3月赴澎湖旅遊的漢詩輯為《澎湖游草》，同年6月赴琉球旅遊的漢詩輯為《琉球游草》，質與量都頗為可觀。

目前有關久保天隨的漢詩研究，在日文方面，相關的研究較少<sup>7</sup>，僅森岡ゆかり曾就久保天隨的漢詩進行探析<sup>8</sup>。在中文方面，則由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發軔<sup>9</sup>，對久保天隨及《澎湖游草》進行有系統的探析。其文關懷的焦點主要有二，其一是通過生平、著述、學術成就三個面向進行作者述評；其二則藉作品內涵與語言風格來闡述《澎湖游草》的特色。前者的目的著意在替久保天隨「建

<sup>6</sup>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年6月3日，報導「臺北帝大教授久保得二博士は腦溢血のため一日午前十一時四十分市内昭和町五一一の自宅に於て遂に逝去した」。

<sup>7</sup> 久保天隨在漢學研究與漢詩創作都有相當可觀的成績，只是關於其人的研究，在日文方面無疑是冷落的，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439，就有這樣的困惑「但不知為什麼，日本學界對他的研究似乎不多」。而島田謹二論述日治時期臺灣日本文學史的《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の台灣體驗》，討論範圍著意在明治與大正時期，因此亦未言及昭和時期來台的久保天隨。

<sup>8</sup> 森岡ゆかり在2005年9月10日，日本天理學會第十五回會議中，發表〈近代日本漢詩人の草山詠—鈴木豹軒と久保天隨を中心に〉；2005年6月18日，第三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發表〈作為文化表象的《游草》—近代日本漢詩人久保天隨之「大東亞」旅遊及其詩〉；2004年11月27日，日本臺灣學會第二回關西部研究大會中，發表〈「大東亞」を旅する漢詩人 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久保天隨の『游草』詩群について〉。這三場會議都以宣讀講綱的形式進行，並未有結集的會議論文，因此無法針對其研究成果進行評析，但就論題而言，並未有專論《澎湖游草》者。但後兩篇論文或有觸及，所謂「大東亞」一詞，是二戰前後日本用以泛指西太平洋地區者，以此論之，應包含久保天隨敘寫日本本國旅遊的《讚州游草》、《關西游草》、《續關西游草》；殖民地旅遊的《權域游草》（朝鮮）、《澎湖游草》、《琉球游草》；中國旅遊的《遼瀋游草》、《閩中游草》。（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皆藏有久保天隨《澎湖游草》，二者係同一版本，其封面右側為「久保天隨先生著」，中以楷書題「澎湖遊草」四字，左側則為「東越林之夏署」，「東越」是「閩越」的別稱，可知題字者應是福建著名書法家，亦是南社主要成員的林之夏（1878-1947）。但在書頁內側，書口（版心）則作「澎湖游草」。可知此書的書名，就原書而言，有兩題，一是林之夏在封面所題的「澎湖遊草」，一是書頁內側書口所作的「澎湖游草」，陳速換的《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從封面的題字，筆者則考量久保天隨相關的游草作品皆作「游」，故從書頁內側的書口作「澎湖游草」，而本書引用《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則從陳氏原文。）

<sup>9</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

立檔案資料」<sup>10</sup>，參閱中日文的傳述、詩文與報刊資料，作者確實替久保天隨建構了條理分明的生平檔案，但仍有許多關鍵點需要補足。如將久保天隨的研究視為臺灣古典文學的一環<sup>11</sup>，似應多關注其與臺灣的關係，交遊部分提及九位中國文人，臺籍者僅列顏雲年（1874-1923）、魏潤庵（1886-1964），就比例而言是不足的，因為久保天隨寓臺六年，與其有詩文往來的臺籍詩人還有「瀛社」的謝雪漁（1871-1953）與王雲滄（?-1947）、「鹿苑吟社」的施梅樵（1870-1949）、「應社」的楊笑儂（生卒年不詳）等，並曾替竹塹詩人王松（1866-1930）遺稿題詩，為《瀛洲詩集》寫序<sup>12</sup>，補足此一空白，將能深化其與臺灣文學的關係。又如其根據《臺南新報》，稱久保天隨的澎湖之行是「到澎湖進行史蹟調查」<sup>13</sup>，這是怎樣的史蹟調查？目的為何？可惜作者都未能說明，如能詳細考辨，應能對《澎湖游草》的創作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

而陳速換第二個關懷的焦點則在詩作本身，試圖解決《澎湖游草》說了什麼<sup>14</sup>及其表現的語言風格<sup>15</sup>，其逐首解讀並嘗試以語言風格學闡析久保天隨的詩作，對《澎湖游草》的研究有奠基之功，可惜只著意在分類舉例，而未進一步闡述詩作內涵及語言內部規律的特殊性。如將「旅遊詩作多」視為久保天隨漢詩的特色之一<sup>16</sup>，但久保天隨游草作品的繁多，或應將觀察角度放在他所置身的時代，如呂紹理（1961-）

<sup>10</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頁 12。

<sup>11</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頁 10，作者稱「日治時期的日籍漢詩亦應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由此，久保天隨的研究當屬於臺灣文學的一環。

<sup>12</sup> 詳細篇目請參考本文註 4。

<sup>13</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頁 120。

<sup>14</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頁 120-148，通過《昭明文選》的選詩分類，將《澎湖遊草》中收錄的詩作，分為「行旅詩」、「詠史詩」、「贈答詩」、「詠物詩」、「雜詩」等五類，依序進行分析。

<sup>15</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頁 149-211，借用語言風格學的分類，將《澎湖遊草》中收錄的詩作，分「音韻風格」、「詞彙風格」、「語法風格」等，依序進行分析。

<sup>16</sup>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

即指出：「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透過媒體的策畫與宣傳，海外旅遊逐漸成爲大正時期日本國民休閒生活的一部分」<sup>17</sup>，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如朝鮮、臺灣、滿州（東北）等地以及漢文化的發源地—中國，都是當時旅遊活動的重要目的地<sup>18</sup>，小說家谷崎潤一郎（1886-1965）就曾到過朝鮮，並有兩次的中國行<sup>19</sup>；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青木正兒（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宇野哲人（1875-1975）都曾到中國旅遊，並留下文字紀錄<sup>20</sup>，所以久保天隨「旅遊詩作多」應是時代的趨勢，而非他個人漢詩獨具的特色。此外借用語言風格學來闡析《澎湖游草》，但在操作上卻僅分類列舉，而未釐析其特殊性，如在「疊字使用」的標目下，列舉 11 條使用疊字之例，但並未進一步說明，所以讀者僅能知曉《澎湖游草》有使用疊字的情形，卻不能掌握其疊字使用的規律性與特殊性。綜上所述，筆者認爲雖已有研究者關注與討論，但就研究數量與深度而言，久保天隨的《澎湖游草》仍存有相當大的闡述空間。

本文以《澎湖游草》爲討論主軸，關注的焦點在久保天隨於漢詩中如何想像與

頁 226。

- <sup>17</sup> 呂紹理，〈觀看文化的興起與浸透〉，《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347。
- <sup>18</sup> 西原大輔著，趙怡譯，《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6，即指出「當時，大批的文人或應南滿州鐵道的邀請，或以個人旅遊的方式奔赴大陸」，其參照 J.A 佛格爾的著作，列舉曾去過中國的日本文學家有森鷗外、二葉亭四迷、正岡子規、夏目漱石、遲冢麗水、田山花袋、佐佐木信綱、河東碧梧桐、與謝野晶子、永井荷風、正宗白鳥、齊藤茂吉、志賀直哉、北原白秋、谷崎潤一郎、菊池寬、長與善郎、久保田萬太郎、村松梢風、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吉川英治、金子重光、吉屋信子、大佛次郎、橫光利一、小林秀雄、中野重治、林芙美子、島木健二等人。西原大輔還指出，除了文學家外，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畫家都曾經去過中國旅行。旅行的名義或是觀光，或是視察臺灣美術展覽會、朝鮮美術展覽會、滿州國美術展覽會等等，可謂名目繁多」（頁 27）。
- <sup>19</sup> 谷崎潤一郎的兩次中國行分別是在 1918 年與 1926 年，第一次旅行的路線是由朝鮮至滿州，然後遊經天津、北京、漢口、南京以及江南一帶。第二次旅行則以上海爲主。有關谷崎潤一郎兩次中國行的詳細日程與遊記篇目，請參閱西原大輔著，趙怡譯，《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五章〈首次中國旅行〉、第六章〈重訪中國〉以及附錄的〈谷崎潤一郎中國旅行日程〉。
- <sup>20</sup> 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宇野哲人等人的中國旅遊路線與遊記篇目，請參閱黃俊傑，〈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279-321。

闡述澎湖。經驗性地來說，「澎湖」是一具體的空間存在，而文本對於「澎湖」的書寫，則屬於空間的再現，因為「再現」，所以涉及書寫者在作品構型過程中的剪輯與詮釋，書寫者從各自的視域「書寫澎湖」，標示行走軌跡，形塑地景圖像，也賦予「澎湖」不同的意義。《澎湖游草》是書寫澎湖的諸多文本之一，而久保天隨遊訪澎湖的目的為何？日治時期的澎湖，其地景有何變化？久保天隨如何想像與闡述澎湖？這些都是本文試圖釐析的重點。

## 二、殖民者的田野蒐集：久保天隨遊訪澎湖的目的

久保天隨終生只到過澎湖一次，時間是在昭和 7 年（1932），同行者有尾崎古村（生卒年不詳）、谷河梅人（生卒年不詳），他們 3 月 3 日由基隆出發，3 月 4 日抵達澎湖，旅遊六日，3 月 9 日夜搭乘開城丸至高雄<sup>21</sup>。其間尾崎秀真曾以臺灣史為主題，在 3 月 6 日晚上 7 時於松島紀念館發表演講<sup>22</sup>。

值得注意的是與久保天隨同行的尾崎古村、谷河梅人都是「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的委員。這是依據昭和 5 年（1930）頒布的「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所成立的委員會，隸屬於臺灣總督府，著意在對臺澎地區的古蹟、名勝及自然生態進行調查與保存的工作<sup>23</sup>，所以久保天隨等人此行應是受臺灣總督府之託，進

<sup>21</sup> 據《澎湖事情》，（臺北：澎湖廳，1929），頁 75，可知 2019 噸的開城丸隸屬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是當時往來臺澎的定期航班，航線有二，一是往來澎湖與高雄，共 74 哩，需 7 小時；一是往來澎湖與基隆，共 195 哩，需時 22 小時。久保天隨一行人是先從基隆搭船至澎湖，旅遊六日後，再由澎湖乘夜船至高雄，然後北返。除了《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的報導外，在久保天隨的詩中，亦可看到此行的路線，如〈三月初四舟抵澎湖〉中提及「滬尾北隔逾十更」，又如有詩〈舟入打狗〉。

<sup>22</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3 月 12 日，第三版〈馬公便り〉。此外，《臺南新報》昭和 7 年 3 月 12 日亦有相關報導。

<sup>23</sup> 依據 1930 年 10 月 16 日頒布的「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規程」，「為調查及審議有關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之事項，茲在臺灣總督府內設置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第一條），其組織則有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及委員若干人，「會長由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副會長由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長分別擔任之。委員則由臺灣總督府部內的官員或學識豐富之學者擔任，由臺灣總督派任或囑託」（第三條）。可知此一調查會是直接隸屬於臺灣總督府。會長與副會長均由總督府官員擔任，委員

行澎湖的古蹟調查<sup>24</sup>。Bernard S. Cohn (1928-2003) 指出，「了解殖民地知識與管理當地的行政機構對統治者同樣具有重要意義」<sup>25</sup>，當帝國統治者透過知識的權力運作去建構殖民地圖象時，各種針對殖民地的調查應是最有力的操作工具，古蹟的調查亦是其中一環。經由調查、了解進而解釋，帝國統治者決定了哪些古蹟是有價值的、應該保存。久保天隨等人此行的目的是替臺灣總督府進行古蹟調查，其立足點應是殖民者的田野蒐集立場，而古蹟的展示 (exhibit)，無疑是此行的焦點。

### 三、毀壞與建設並行的國境之南： 日治時期澎湖的地景變遷

雖然資源貧瘠<sup>26</sup>，但由於地理位置的優越，澎湖從大航海時代開始，即成為閩臺之間的中繼站，控制著海峽南北貿易的航線，同時兼具戰略與經濟的價值。明代荷蘭人曾兩次入澎，熹宗天啓 2 年 (1622)，雷爾生 (Cornelis Reyerssen) (?-1625) 在風櫃尾蛇頭山構築荷蘭城堡 (Pescadores)<sup>27</sup>，明軍伐澎，荷人退走臺灣，天啓 5

---

或是總督府官員，或是學者 (多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皆由臺灣總督任命。

<sup>24</sup> 尾崎古村、谷河梅人在昭和 11 年 (1936)，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出版的《史蹟調查報告第二輯》，頁 73-74，發表〈比志島混成枝隊良文港上陸地〉，應為澎湖古蹟調查的成果。其中比志島混成枝隊良文港上陸地在昭和 10 年 (1935) 被列入國指定之史蹟。

<sup>25</sup> 柯恩 (Bernard S. Cohn)，〈維多利亞時期權威在印度的展現〉，《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頁 231。

<sup>26</sup> 據《續修澎湖縣志·卷八城市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 1-2，澎湖由於「強風」與「鹹雨」，「長期以來，草木萬物難以順利生長，農作生產受到極大限制，經濟力薄弱，地區發展乃相當緩慢，直至近百年間方漸有改善」。

<sup>27</sup> 荷蘭人在澎湖所築的荷蘭城堡，一般多認為其位於馬公街外之紅木埕一帶，但據林會承，〈澎湖風櫃尾荷蘭城堡—被遺忘的臺灣第一座西式城堡〉，《歷史月刊》第 147 期，頁 13-17，紅木埕的古城遺跡其實是明朝所興建的穩澳城堡所在，風櫃尾蛇頭山的古城堡才是荷蘭城堡。關於風櫃尾的古城遺跡，日治時期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曾於昭和 7 年 (1932) 到風櫃尾探勘，並認定位於海岬上的方形土圍即荷蘭城堡的遺跡，並將其列入「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名單中。民國 61 年 (1972) 荷蘭學者包樂史也親往證實。中研院士曹永和，〈澎湖之紅毛城與天啓明城〉，《澎湖開拓史學術研討會實錄：西臺古堡建堡暨媽宮城建城一百週年》，(澎湖：澎湖縣政府，1989)，頁 131-154，透過荷蘭

年至 6 年間（1625-1626）明王朝整修風櫃尾蛇頭山的荷蘭城堡，作為砲臺使用，另在媽宮（今馬公紅木埕）興建方形城堡一座，於西安、案山各築建銃城一座，澎湖因此而躍升為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重地<sup>28</sup>。

明鄭與清領時期，澎湖仍被視為重要的軍事重地，媽宮長期駐有重兵。光緒 10 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法將領孤拔（Admiral Courbet, 1826-1885）攻佔澎湖，讓清帝國重新審視澎湖的戰略地位。光緒 13 年（1887）以媽宮為軍事指揮中心，興建砲臺四座，各式大小新砲十七門<sup>29</sup>，並築造媽宮城（又名澎湖城），設立火藥庫、水雷局、電報局等軍事設施<sup>30</sup>。值得注意的是媽宮的建城是將大規模且有系統的人為空間計畫，實施在澎湖最主要的聚落，考量的是國防與軍事的需求，其以「城」為營建主體，將舊的媽宮聚落圍圈於其中，「此舉雖改變了當時媽宮聚落的既有領域和邊界外觀，並建構了新的空間秩序，然對舊市街的空間結構並未造成激烈之衝擊」<sup>31</sup>。

澎湖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肇端於日治時期的改造。日本殖民政府一方面從戰略位置來確立澎湖的地位—「澎湖是東亞交通之咽喉要道，是日本的南方門戶，與清國福建艦隊之根據地福州灣，僅一水之隔，到達英國東洋艦隊基地之香港，及美國位於東洋唯一之軍港馬尼拉之斯比克灣，亦皆只有一日多的航程，而與法國東洋艦隊基地西貢，又不太遠。基於以上諸點，澎湖形成了日本帝國之第一道關卡，又是臺灣島之鎖鑰」<sup>32</sup>，致力於將澎湖建設為日本帝國的軍港，陸續在馬公對岸的測天島設置馬公要港部、要塞司令部、水雷敷設隊、重砲兵隊、港務部、憲兵隊、

---

檔案，再度證實風櫃尾的土圍即荷蘭城堡的遺跡。其後經學者多次勘查，此一遺跡在民國 90 年（2001），被列為國定古蹟。如同《續修澎湖縣志·卷十三文化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 81，所言的風櫃尾荷蘭城堡「是荷蘭在東亞占據的第一個據點，象徵西方勢力逐鹿臺灣的開端，歷史意義深遠」。

<sup>28</sup> 林會承，〈澎湖聚落的形成與變遷·上〉，《文化與建築研究期刊》第 4 期，頁 22。

<sup>29</sup> 黃小平，〈清代澎湖經營之研究〉，《大陸雜誌》1975 年第 50 卷第 4 期，頁 10-31。

<sup>30</sup> 林豪，《澎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51、161。

<sup>31</sup> 張玉璜，《媽宮（1604-1945）一個臺灣傳統城鎮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59。

<sup>32</sup>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序》，（東京：以文館，1911），頁 1，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土記·上》，《礎石古石》第 40 期，頁 69。

衛戍病院等<sup>33</sup>。另一方面，則計畫性的介入澎湖的空間營造與地景生產，要將澎湖改造成現代化的市鎮。20世紀初始，已著手拆除媽宮城部分城壁，進行市區道路的拓寬。大正元年（1912），臺灣總督府頒布「媽宮市區改正計畫」，劃設都市路網<sup>34</sup>。其後並陸續植入代表進步現代的標記，如電力<sup>35</sup>、自來水<sup>36</sup>、下水道<sup>37</sup>、公路<sup>38</sup>與公共建築（學校、醫院、銀行、郵局、圖書館）。在這過程中，毀壞與建設同時並進，屬於清帝國印記的媽宮城牆被拆毀，展示現代化的設施不斷樹立，此時澎湖的地景在殖民母國的積極介入下，已呈現不同於清領時期的傳統漢人聚落的樣態，而是複製了日本現代化經驗的城鎮空間。不過日人對澎湖的空間改造並不是均等的，其改造最有力者在馬公，「其餘聚落多仍延續舊有傳統空間結構進行有限度的改造與發展」<sup>39</sup>。

<sup>33</sup> 據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十五軍事》，（東京：以文館，1911），頁65。要港部的司令官是由海軍中將擔任，負責澎湖港口的防禦工作與附近海岸與海面的警備。要塞部的司令官則由陸軍少將擔任，負責要塞的防禦工作。當時日本政府徵用小案山的土地，稱之為測天島，島上設置與海軍相關的設施。西川伍，《波瀾起伏的昭和史—懷念的澎湖島·上》，《碇石古石》第40期，頁49，「馬公街的對面有測天島，測天島大半是屬海軍相關的設施，尤其是以海軍工廠為主體所成立的基地」、「測天島周圍都是海，上學校的路線會經過海邊到碼頭。又此地與彼岸的馬公街形環抱之勢而成海灣，我們住家所在地稱為『小案山』，若要經由陸地前往馬公，不經『大案山』是無法到達對岸馬公的，兩地相隔約有10公里遠的距離。但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利用港務部的定期船渡海往返兩地。軍人以海軍守備隊為骨幹，各要地均設有海軍的衛兵崗哨，持槍的水兵站崗監視著」。

<sup>34</sup> 據《續修澎湖縣志·卷八城市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16，「日本統治初期，大幅整頓媽宮市容與環境衛生，積極建設現代化公用設施，城市乃有點狀的空間改造。自1910年代起，分兩個階段施行都市計畫」。第一個階段是由大正元年（1912）始，第二個階段則自昭和10年（1935）展開。

<sup>35</sup> 《澎湖縣政府府史》，（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23，「大正2年（民國2年，1913），設立澎湖電燈株式會社，開始供電（媽宮地區）」。

<sup>36</sup> 《澎湖事情》，（臺北：澎湖廳，1929），頁23-24，「馬公水道（即自來水廠）是昭和2年6月開工，昭和4年3月竣工」，「給水能力最大二萬五千立方公尺，最小一萬八千立方公尺，平均二萬立方公尺。給水人口預定七千人（現在五千八百人）」。

<sup>37</sup> 《澎湖事情》，（臺北：澎湖廳，1929），頁24，馬公街的下水道工事從大正10年以降至昭和2年，共完成大中小下水溝1611間，昭和3年又有576間完成。

<sup>38</sup> 《澎湖縣政府府史》，（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24，「昭和2年（民國16年，1927），開始建設公路，並開辦馬公、湖西間公共汽車營運；民間亦開始經營小客車，澎湖陸上交通由轎和牛車進入汽車時代」。

<sup>39</sup> 《續修澎湖縣志·卷八城市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6。

除了介入地景的形塑，日本殖民政府亦從空間文化著手，展現權力符碼。統治當局一方面派遣學者積極投入古蹟、名勝及自然生態的調查；一方面則藉由上陸紀念碑、千人塚、松島艦遭難紀念碑、ボクハラ遭難紀念碑、軍艦廣丙號遭難紀念碑、第十六號水雷艇遭難紀念碑、奈良丸遭難紀念碑等的設置，象徵「日本統治澎湖的符碼」，具體指涉日本帝國權力及於澎湖土地的事實。

這就是昭和 7 年（1932）久保天隨所到訪的澎湖，在這被標示為「帝國最西南端的離島，國家的干城，國防的第一線」<sup>40</sup>的國境之南，屬於清帝國的印記上漸次複製日本的現代化經驗，屬於漢民族的世代記憶中則被強行植入殖民母國的權力符碼。

#### 四、南方邊陲的獵奇與懷古： 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

國境之南是一個充滿想像的地方，《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就將澎湖與浦島太郎的傳說緊緊纏繞，以媽宮城印證繪卷中的龍宮；以浮在澎湖海域的六十四個島嶼，指涉平安時期詩人小野篁（802-852）以和歌描述的綺麗海島<sup>41</sup>。除了附會的傳說之外，日治時期的澎湖雖「劃入帝國版圖，然居民依然大抵為中國人種」<sup>42</sup>，氣候、風土、人情亦與日本本土大相逕庭，旅者久保天隨走過這片土地，雖未跨越國界，腳下卻是不同的國度。他如何以漢詩為媒介詮釋澎湖？在這旅者的凝視中，又透滲著何種想像呢？這是本節所欲釐析的重點。

<sup>40</sup> 〈澎湖島へ〉，此為日治時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高雄支店印刊的澎湖旅行宣傳小冊，除了介紹澎湖島的特色外，還有航班時間，船資與澎湖的景點介紹。

<sup>41</sup> 杉林靖憲，《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臺南：臺日社臺南支局，1925），頁 1-4，第一章〈龍宮の傳說と澎湖〉。小野篁的詩是「和田の原八十島かけて漕き出でぬと、人には告げよ 艇の釣船」。此外，日治時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高雄支店印刊的澎湖旅行宣傳小冊〈澎湖島へ〉，卷首亦直指澎湖為浦島太郎遊歷之地，是傳說的澎湖島。

<sup>42</sup>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住民》，（東京：以文館，1911），頁 11，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

## (一) 物候的書寫

### 1、多風的炎荒之地

施懿琳曾借用李維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 1908-) 對異域的觀察，指出「當旅行者到達一個陌生地方時，最直接感應到的是標誌著這『新世界』特色的：氣候、地形以及植物」<sup>43</sup>。昭和7年(1932)3月，久保天隨來到澎湖，時節還在春天，炎熱的空氣卻完全佔據了澎湖島。他稱澎湖為「炎荒」<sup>44</sup>，船剛駛向異域之岸，就感到「浦口春燠疊微瀾」<sup>45</sup>，穿行在島嶼，又發出「怪底澎湖四時燠，却少卉木娛心目」<sup>46</sup>的喟嘆。他曾以白描的文字，描繪這南國邊境的苦熱：

一路炎塵爛午暉，行人苦熱汗頻揮。偶過遺跡思疇昔，嘉蔭亭邊綠四圍。<sup>47</sup>(澎湖雜詩之六)

沿路而行，烈日讓塵土都有了灼燙的溫度，而汗水浸濕髮膚，行人多感到苦熱難耐。惟有嘉蔭亭旁，澎湖少見的綠意之下，能得到短暫的歇息，懷想過往的種種。可以發現久保天隨筆下的澎湖，燠熱無所不在。

除了燠熱外，多風亦是久保天隨對澎湖的深刻印象。如〈望安值風〉五首，即是詩人在望安島遇疾風，船隻無法航行所作：

黑溝潮氣送斜曛，天水膠黏黯不分，咫尺桶盤風匱外，積陰結作礮車雲。<sup>48</sup>

雲車載日過檣頭，白馬蹴空潮逆流，偏怕歸舟滯孤島，直將戟手罵陽侯。<sup>49</sup>

---

土記·中》，《碇石古石》第41期，頁101。

<sup>43</sup> 施懿琳，〈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崁集》的臺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第15期，頁109。其所借用的觀察來自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這是自傳體的民族誌遊記，敘寫李維史陀在卡都衛歐、波洛洛、南比克瓦拉、土比克瓦希普族等原始部落裡探險、思考與生活的經驗。

<sup>44</sup> 久保天隨，〈通梁古榕歌〉，《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1下，「蔽日銷暑功難測，炎荒缺此物不得」。

<sup>45</sup> 久保天隨，〈三月初四舟抵澎湖〉，《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1下。

<sup>46</sup> 久保天隨，〈通梁古榕歌〉，《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2上。

<sup>47</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六，《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7下。

<sup>48</sup> 久保天隨，〈望安值風〉之一，《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5下。

捲地風來浪不平，海心彷彿起長鯨，元知宇宙浮漚似，莫怪扁舟一葉輕。<sup>50</sup>

橫掣急流潮怒奔，何來曙色變乾坤，天風簸盪魚龍氣，又趁崩濤出海門。<sup>51</sup>

弱水重環群嶼堆，銀濤百尺劇崔嵬，海天忽潑晚雲黑，舟自蛟宮深處回。<sup>52</sup>

可以讀出風島澎湖正向詩人展示「自然雄渾」(the natural sublime)的力量，狂風挾浪濤而來，「捲地風來浪不平，海心彷彿起長鯨」、「弱水重環群嶼堆，銀濤百尺劇崔嵬」，當晦暗被推向極遠的天空，是「積陰結作礮車雲」、「海天忽潑晚雲黑」、「橫掣急流潮怒奔，何來曙色變乾坤」，置身其中的人，面對自然的力量，倉皇之中，不免無助與恐懼，「偏怕歸舟滯孤島，直將戟手罵陽侯」，更深刻的領悟源於人類自身的渺小，「元知宇宙浮漚似，莫怪扁舟一葉輕」，所以船入港灣，竟有「舟自蛟宮深處回」的感發。這是人類主體面對雄渾的自然客體所產生的震懾。

而澎湖的風除了翻掘海洋，久保天隨也注意到其對於島嶼陸地的驚擾，如：

白晝魚龍亦奮揚，風沙滿目失青蒼，石稱老古鬆而脆，為護蔬畦築作牆。<sup>53</sup>(澎湖雜詩之七)

日暈欲煙天晦冥，旋風鼓勢震窓櫺，最驚鹹雨驟風後，環屋明朝無一青。<sup>54</sup>(澎湖雜詩之八)

疾風行經之處，混雜著沙塵，讓窗櫺發出震悚的音聲，然後是「白晝魚龍亦奮揚，風沙滿目失青蒼」、「最驚鹹雨驟風後，環屋明朝無一青」，風暎之後，島嶼也失去了蒼翠的顏色。明明該是草木豐美的熱帶島嶼，詩人卻「訝看絕島翠巒無」<sup>55</sup>。這訝異來自於實地旅行與期待中的旅行間的落差，如同《澎湖風土記》所言的：「澎湖群島綿互在亞熱帶之海上，因而世人大多將之想像成四季枝繁葉茂、百花爭豔、

<sup>49</sup> 久保天隨，〈望安值風〉之二，《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5下。

<sup>50</sup> 久保天隨，〈望安值風〉之三，《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5下。

<sup>51</sup> 久保天隨，〈望安值風〉之四，《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6上。

<sup>52</sup> 久保天隨，〈望安值風〉之五，《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5下。

<sup>53</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七，《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7下。

<sup>54</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八，《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7下。

<sup>55</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二，《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7上。

鳥獸齊鳴，濃烈南洋風情所在。然而很不幸地卻是不然，相反地本地冬季之東北季風呼嘯狂掃數日不歇，因而草木無從自然成長」<sup>56</sup>，對於久保天隨而言，燠熱多風又缺乏翠綠山巒的澎湖，似乎是一個超出想像的南方，一個多風的炎荒之地。

## 2、內部的他者

日治時期的澎湖，雖劃入日本帝國的版圖，卻又充滿異質性，這遙遠的異域，就殖民母國而言，是內部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但對於短暫旅行的旅者，無疑充滿著異國情調的。Alain Botton (1969-) 認為「異國情調一詞包含有一些更細微、更讓人捉摸不定的意義，異域的魅力源發于新奇與變化，譬如在異域你看到的是駱駝，而在家鄉，你看到的是馬匹；在異域你看到的是不加粉飾的公寓房，而在家鄉，你看到的是帶有裝飾性石柱的公寓房」<sup>57</sup>，久保天隨的澎湖書寫常以獵奇的眼光凝視異文化的他者，捕捉其中的異國情調。如對澎湖女性的描述：

健婦力耕紅芋栽，夕陽野徑尚徘徊。但因灌溉無溝洫，不見禾田畝樣開。<sup>58</sup>（澎湖雜詩之十二）

青布裙長隨步飄，妙齡仍見好風標，生來機杼都無用，囑付鮫人日織綃。<sup>59</sup>（澎湖雜詩之十六）

在漢文化圈中，男性所認同的女性形象是「柔弱、美麗、附屬」，但澎湖女性卻「素勞動，吃苦過於男人，不但伴隨男人漁撈採捕，更因男人討海，土地耕種必須一身挑擔」<sup>60</sup>，所以俗諺稱「澎湖女人臺灣牛」，把澎湖女人類比為任勞任怨的臺灣牛。

<sup>56</sup>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序》，（東京：以文館，1911），頁 3，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土記·上》，《碇石古石》第 40 期，頁 73。

<sup>57</sup> Alain Botton 著，南治國、彭俊豪、何世原譯，《旅行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頁 76。

<sup>58</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十二，《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8 上。

<sup>59</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十六，《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7 下。

<sup>60</sup> 徐麗霞，〈劉家謀詩作的澎湖庶民圖象·上〉，《中國語文》576 期，頁 106。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1911），頁 72，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土記·下》，《碇石古石》第 42 期，頁 110，亦言「澎湖居民，男耕，女不織，是以女子亦從事莊稼。且女人比男人更加操勞。男人僅執趕拖著犁耙之耕牛翻土而已，其餘之農事，如花生高粱之播種、甘藷幼苗之栽植、經常性

而這樣的女性形象在旅者眼中，無疑是極具異國情調的他者，久保天隨以「健婦力耕紅芋栽，夕陽野徑尚徘徊」描繪澎湖女性的韌毅，那身影靜默地守望在沒有灌溉水道的田間。「青布裙長隨步飄，妙齡仍見好風標」則藉由衣飾辨識其與日本（或臺灣）女性的差異，因為澎湖女性「喜穿蔚藍色衣服」<sup>61</sup>，所以詩人以此為標記，並由「澎湖本地不植桑，亦不產麻，因而女子無從事紡織工作者」<sup>62</sup>，想像神話中的鮫人，在南海水域為其紡著細密的絹紗。這顯然是出自旅者的異想，將異文化的他者，賦予浪漫化的想像。

又如久保天隨常將澎湖喻寫為仙島—「仙島本與塵世遠，幾人來此憺忘返」<sup>63</sup>、「遠水無波浮冥色，依稀三十六蓬壺」<sup>64</sup>，這種想像應是建立在廣袤無際的海天意象中，使旅者產生視覺與心理的震懾，這南方異域因而被解讀為神話中的淨土。走入淨土中，是「魚價賤如泥，而抵太牢美。地僻物產饒，晏居藐城市」<sup>65</sup>，「但惜少教化，依然習俗鄙」<sup>66</sup>則來自殖民者優越臨下的觀察視域。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積極複製歐洲文明，現代化普遍被視為文明化的表徵<sup>67</sup>。當日本成為現代殖民母國，面對殖民地，常「用近代化的優勢，以文明的傳播者自居，藉著教育『落後』的原住民為理由，賦予本身支配的正當性」<sup>68</sup>，而在將澎湖喻寫為仙島的同時，久保天隨亦不自覺地對澎湖投以殖民者檢視的眼光。

可以發現當澎湖成為久保天隨以獵奇眼光所凝視的他者，其所突顯的是異域的異質性，詩人一方面捕捉異國情調，將異文化的他者浪漫化，一方面又站在殖民者

---

除草等工作，則大抵為婦女所負責」。

<sup>61</sup>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1911），頁 100，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土記·下》，《碇石古石》第 42 期，頁 123。

<sup>62</sup>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1911），頁 100，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土記·下》，《碇石古石》第 42 期，頁 123。

<sup>63</sup> 久保天隨，〈三月初四舟抵澎湖〉，《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1 下。

<sup>64</sup> 久保天隨，〈晚自白沙島歸馬公港〉，《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2 下。

<sup>65</sup> 久保天隨，〈漁翁島〉，《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4 下。

<sup>66</sup> 久保天隨，〈漁翁島〉，《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4 下。

<sup>67</sup> 請參閱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9-13。

<sup>68</sup>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62。

的立場以優越臨下的觀察視域進行檢視。

## （二）懷古的書寫

久保天隨遊訪澎湖的目的是替臺灣總督府進行古蹟調查，古蹟如同一個舞台（Stage），暗示著錯綜的典故，詩人盤桓其間，垂首俯視，因而追憶依附其上的歷史人事。當這種追憶以漢詩作為表現媒介，就不得不進入中國詩的傳統，如同鄭毓瑜（1959-）所言的：「一旦選擇某種文體，就彷彿進入歷史文化的迴廊，在一種熟悉的語句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共享傳統的書寫活動」<sup>69</sup>，而「中國傳統是以主體的展現作為詩的本質意義」<sup>70</sup>，也就是說當久保天隨選擇以漢詩來書寫懷古主題<sup>71</sup>，其必然以充滿自我影像的方式去描述他所關切的情節故事。

### 1、失意者的凝視

當詩人來回地穿梭在澎湖的歷史空間中，許多感慨從衰敗的遺跡中湧現，如〈法國提督孤拔墓址〉：

絕海遠征偏苦辛，胸中韜略不輸人。天低虎井風雲惡，城接龍宮旗幟新。既有鯨鯢來助戰，却因瘴癘遽捐身。于今遺恨滄波闊，手撫殘碑淚濕巾。<sup>72</sup>

法國提督孤拔（1826-1885）即 Admiral Courbet，孤拔墓址「位於媽公城北之拱辰門外。清光緒 11 年，法國艦隊佔領澎湖島時，其水師提督孤拔，病歿於此」<sup>73</sup>，久保天隨對於孤拔的敘述重心是放在命運的乖舛與無奈，「絕海遠征偏苦辛，胸中韜略

<sup>69</sup>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193。

<sup>70</sup>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導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頁 11。

<sup>71</sup> 目前學界對於懷古主題的定義，普遍認為是因實際登覽古蹟或特定地點，由眼前景物觸發而詠，與讀史而詠的詠史主題有所區別。參見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 7。

<sup>72</sup> 久保天隨，〈法國提督孤拔墓址〉，《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3 下。

<sup>73</sup>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序》，（東京：以文館，1911），頁 61，譯文引自林有忠翻譯的《澎湖風土記·下》，《碇石古石》第 42 期，頁 103。

不輸人」寫其人的雄略與抱負，「天低虎井風雲惡，城接龍宮旗幟新」點出征戰的地域與場景，「既有鯨鯢來助戰，却因瘴癘遽捐身」則標出「有才無命」的遺憾，並引出「于今遺恨滄波闊，手撫殘碑淚濕巾」的感懷。壯志未酬的「恨」顯然是全詩的骨幹，是久保天隨對於孤拔的同情與理解。

又如：〈大武山弔明盧牧洲尚書〉之一：

衣冠儼作好儀容，想見金門秀氣鍾。抗疏禁闈推宰輔，著書叔世仰儒宗。中原戰罷奔無鹿，大澤春寒蟄有龍。悵絕澎湖潮似咽，騎箕一去夜雲重。<sup>74</sup>

盧牧州即盧若騰（1598-1663），崇禎 13 年（1640）進士，為人正直，敢直諫，曾追隨魯王、桂王與鄭成功抗清，永曆 17 年（1663）病逝澎湖，葬於太武山南麓，康熙年間遷葬至原籍金門。久保天隨到訪盧若騰墓址，「衣冠儼作好儀容，想見金門秀氣鍾。抗疏禁闈推宰輔，著書叔世仰儒宗」是對其人格的景仰與尊崇，「中原戰罷奔無鹿，大澤春寒蟄有龍。悵絕澎湖潮似咽，騎箕一去夜雲重」則感慨時運不濟，縱有將相的才智謀略，卻只能抱恨以歿。充滿遺憾的「悵」字，透顯出詩人的愴然。

這種「有才無命」的悲慨，亦見於「當時遁竄喜天幸，憐殺敗軍劉國軒」<sup>75</sup>、「黑海無邊遺恨在，洋心誰弔李長庚」<sup>76</sup>等詩句，可以發現懷抱遺憾的能人與英雄，特別容易觸發久保天隨的感懷。至於施琅（1621-1696）這類具有人間事功的勝利者，則較少著墨<sup>77</sup>。此一現象和作者自身人格的潛在因素應有密切關係。久保天隨雖畢業於東京大學漢學科與研究所，但因「因生性怕拘束，也不喜歡交際，且患有口吃，更避世間之交際，故研究所畢業後約二十年不就定職，以著述為業」<sup>78</sup>，時不我予的落寞時見在他的詩作中，如「劇憐薄官甘趨走，世爭錙銖吾獨否。堂堂七尺好丈

<sup>74</sup> 久保天隨，〈大武山弔明盧牧洲尚書〉之一，《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3 下。

<sup>75</sup> 久保天隨，〈晚自白沙島歸馬公港〉四首之三，《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2 下。

<sup>76</sup> 久保天隨，〈大武山弔明盧牧洲尚書〉，《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3 下-4 上。

<sup>77</sup> 久保天隨，〈澎湖雜詩〉之十七，《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 8 下，「精誠宛與耿恭同，井底噴珠泉眼通，儘遣居民朝暮汲，千秋遺澤憶施公」，此詩雖提及施琅，但著眼點在萬軍井的遺跡，而非敘寫施琅。

<sup>78</sup> 張寶三，〈久保得二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臺北：臺灣大學中

夫，行路難兮蹉跎久」<sup>79</sup>，從失意者的眼光凝望，恆常召喚不遇與無命的英雄群像，讓久保天隨對於澎湖的懷古書寫蘊含著感傷的氛圍。

## 2、靜止在中國的界域

在久保天隨的澎湖書寫中，有一值得觀察的特殊現象。那就是當他和尾崎谷村、谷河梅人以古蹟考察為目的，穿行在澎湖時，他們所觀覽的對象必然同時含括中國與日本的歷史符碼。其中比志島混成枝隊良文港上陸地在昭和 10 年（1936）被列入國指定之史蹟，與久保天隨同行的尾崎谷村、谷河梅人曾共同發表〈比志島混成枝隊良文港上陸地〉<sup>80</sup>，但在久保天隨的《澎湖游草》中卻無一詩提及。現將《澎湖游草》與當時澎湖文獻中所展示的古蹟名勝，羅列於后：

名稱	澎湖游草 (1932)	澎湖風土記 (1911)	澎湖を古今に 涉りて(1925)	澎湖事情 (1929)	澎湖島へ (1934)
媽宮城址		○	○	○	○
瓦洞港城		○			
虎井沉城	○	○			
文石書院 澎湖廳指定 史蹟，1941 年 國指定史蹟	○		○	○	○
通梁古榕	○		○	○	
紅木埕城址	○	○	○	○	○
媽祖宮	○		○	○	○
施將軍廟			○	○	○
觀音亭	○		○	○	○
嘉蔭亭	○		○	○	
澎湖神社				○	○
上陸紀念碑 1935 年國指 定史蹟			○	○	

國文學系，2002）。

<sup>79</sup> 久保天隨，〈題松田蜂城風月窟詩鈔〉，《秋碧吟廬詩鈔·戊籤》卷十三，（東京：久保舜一，1938），頁 1 上。

<sup>80</sup> 尾崎古村、谷河梅人在昭和 11 年（1936），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出版的《史蹟調查報告第二輯》，頁 73-74，發表〈比志島混成枝隊良文港上陸地〉，應為澎湖古蹟調查的成果。

千人塚 1941年國指定史蹟		○	○		○
萬歲井			○	○	
萬軍井	○		○	○	
田中井			○	○	○
廬若騰墓址 澎湖廳指定史蹟	○	○			
孤拔墓址 澎湖廳名勝	○	○	○	○	○
萬人塚		○	○	○	
松島艦遭難 記念碑			○	○	
ボクハラ遭 難記念碑			○	○	
軍艦廣丙號 遭難記念碑		○	○	○	
第十六號水 雷艇遭難記念 碑		○	○	○	
奈良丸遭難 記念碑			○	○	
七美人墓	○		○	○	
北島燈臺				○	
漁翁島燈臺	○		○	○	
網按城		○			
四角嶼砲臺		○			
西嶼落霞	○			○	

由上可知，除了孤拔墓址外，久保天隨所提及的都是中國的史事與古蹟，更確切地說，《澎湖游草》完全略過「日本統治澎湖的符碼」，對於一位日本漢詩人而言，是相當弔詭的。在〈後藤少將招飲〉一詩中，或許可尋索些微端倪：

君既知吾弟，清歡亦夙因，乘桴茲作客，倒屣豈無人，大海馳鯨浪，鄰邦捲戰塵，劇談忘夜永，時事足傷神。<sup>81</sup>

後藤少將即後藤章（生卒年不詳），時任馬公要港部司令官，此詩述及「大海馳鯨

<sup>81</sup> 久保天隨，〈後藤少將招飲〉，《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4上。

浪，鄰邦捲戰塵，劇談忘夜永，時事足傷神」，捲入戰塵的「鄰邦」應為中國，這一年的1月28日日本帝國在上海製造事端（一二八事變），中日雙方衝突迭起，多次交戰。昭和7年（1932）2月1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來自馬公特電：「汕頭、福州、廈門表面平靜，但仍憂慮異狀的發生」<sup>82</sup>，同年3月5日的馬公特電，則刊載「據要港部發表，對岸情報，汕頭僑民外出，現尚危險」<sup>83</sup>，居於前線的澎湖，情勢必然危急艱困，而這或是讓久保天隨傷神的「時事」，這些「時事」也導致其與中國友人的情誼產生變化，如陳衍（1609-1671）在《澎湖游草·序》中就直言「余以為近者兩國失和，連歲兵連禍結，非樽俎縞紵之時」<sup>84</sup>，種種傷神之事，或是久保天隨避開「日本統治澎湖的符碼」，專注書寫中國的古蹟與史事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說當久保天隨以源於中國的漢詩來書寫澎湖時，他偏好以中國的符碼來標記島嶼的身世，並以中國史冊的典故密密註腳，這讓他的澎湖書寫，無論語境或情調都完全靜止於中國的界域，如同林竹影（生卒年不詳）所指稱的—「往從臺灣報紙讀久保先生詩，疑為我國人」<sup>85</sup>。

## 五、結語

久保天隨的澎湖之旅是以古蹟調查為目的，當時的澎湖毀壞與建設同時並進，屬於清帝國印記的媽宮城牆被拆毀，展示現代化的設施不斷樹立，而統治當局一方面積極投入古蹟、名勝及自然生態的調查；一方面則藉由設置上陸紀念碑、千人塚、松島艦遭難紀念碑等象徵「日本統治澎湖的符碼」，具體指涉日本帝國權力及於澎湖土地的事實。只是當詩人來到這遙遠的國境之南，應仍能感受到相應於殖民母國的異質性，因為從人種，氣候、風土到人情，此地都是異域，雖未跨越國界，腳下

<sup>82</sup> 昭和7年（1932）2月1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二版。

<sup>83</sup> 昭和7年（1932）3月1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一版。

<sup>84</sup> 陳衍，《澎湖游草·序》，（不明：作者自印，1932），葉1上。

<sup>85</sup> 林竹影，《閩中游草·序》，（不明：作者自印，1931），葉1上。

卻是不同的國度。

詩人久保天隨對澎湖的凝視，是從物候開始，即使時節仍在初春，但旅者的身體肌膚卻敏銳地感受到島嶼蓄積的飽滿熱氣，在船剛駛向異域之岸時，在穿行島嶼時，所以燠熱出現在詩中每個能見的場域，幾乎無所不在。而海島澎湖的多風，則被揉成令人震懾的意象，分從翻掘海洋與驚擾陸地兩個層面來展現，海洋的風是一種「自然雄渾」(the natural sublime)的力量，讓人類主體感到無助與恐懼，也體會自身的渺小。陸地的風在聽覺上是「旋風鼓勢震窓櫺」，聲聲穿刺人心，在視覺上則是「最驚鹹雨驟風後，環屋明朝無一青」，風喉之後，島嶼也失去了蒼翠的顏色。明明該是草木豐美的熱帶島嶼，詩人卻「訝看絕島翠巒無」。可以發現對於久保天隨而言，燠熱多風又缺乏翠綠山巒的澎湖，似乎是一個超出想像的南方，一個多風的炎荒之地。而在這南方異域中充滿異國情調的他者，往往成為詩人獵奇眼光注視的對象，如被類比為臺灣牛的澎湖女性，又如神話淨土的附會，投之以獵奇的眼光，其所突顯的是異域的異質性，所以詩人常一方面捕捉異國情調，將異文化的他者浪漫化，一方面卻又不自覺地站在殖民者的立場以優越臨下的觀察視域進行檢視。

在懷古書寫方面，既然有「懷」，其必然以充滿自我影像的方式去描述他所關切的「古」，詩人感官所及的古蹟，不僅僅是客觀的存在，因為書寫本身具有極強的簡括性，寫作者可以在記憶的膠卷中，選擇剪輯的角度與書寫對象。久保天隨有關澎湖的懷古書寫，常迴盪著一種「有才無命」的悲慨，「既有鯨鯢來助戰，却因瘴癘遽捐身」的法國提督孤拔如此，「中原戰罷奔無鹿，大澤春寒螫有龍」的盧若騰亦是如此，可以發現懷抱遺憾的能人與英雄，特別容易觸發詩人的感懷。而具有人間事功的勝利者，則較少著墨。此一現象和作者時不我予的落寞應有密切關係，通過失意者的凝視來檢視澎湖的歷史人事，恆常召喚不遇與無命的英雄群像，讓其懷古書寫蘊含著感傷的氛圍。此外，久保天隨的澎湖懷古書寫中，還有一值得觀察的特殊現象，那就是《澎湖游草》完全略過「日本統治澎湖的符碼」，除了孤拔墓址外，久保天隨詩中所提及的都是中國的史事與古蹟，對於一位日本漢詩人而言，是相當弔詭的。這和當時中日兩國的對峙衝突，或有相關。但以中國的符碼來標記

島嶼的身世，並以中國史冊的典故密密註腳，這讓久保天隨的澎湖書寫，無論語境或情調都完全靜止於中國的界域。

以上是本文通過久保天隨敘寫澎湖的文本，從物候與懷古兩個層面建構的澎湖圖象。追躡詩人的履履，我們看見他在特定時間，於這空間地域遺留的駐足與凝視。那是我們熟悉與不熟悉的澎湖。熟悉的燠熱多風，至今仍在不同的澎湖書寫中流轉，而不熟悉的感傷氛圍則釋放著詩人的感懷，二者交織成昭和 7 年（1932）詩人在詩中琢磨發光的南方島嶼。

## 引用書目

### 一、久保天隨著作

- 久保天隨 1931 《閩中游草》，不明：作者自印。  
久保天隨 1932 《澎湖游草》，不明：作者自印。  
久保天隨 1938 《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東京：久保舜一印行。

### 二、澎湖的文獻資料

- 胡建偉 2004 《澎湖紀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林豪 1963 《澎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杉林靖憲 1925 《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臺南：臺日社臺南支局。  
井田麟鹿 1911 《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  
井田麟鹿著，林有忠譯 2005 《澎湖風土記·上》，《碇石古石》第40期。  
井田麟鹿著，林有忠譯 2005 《澎湖風土記·中》，《碇石古石》第41期。  
井田麟鹿著，林有忠譯 2006 《澎湖風土記·下》，《碇石古石》第42期。  
西川伍著，黃有興譯 2005 《波瀾起伏的昭和史—懷念的澎湖島·上》，《碇石古石》第40期。  
西川伍著，黃有興譯 2005 《波瀾起伏的昭和史—懷念的澎湖島·中》，《碇石古石》第41期。  
西川伍著，黃有興譯 2006 《波瀾起伏的昭和史—懷念的澎湖島·下》，《碇石古石》第42期。  
澎湖廳編 1929 《澎湖事情》，臺北：澎湖廳。  
許仙姬編纂 2005 《續修澎湖縣志·卷八城市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許仙姬編纂 2005 《續修澎湖縣志·卷十三文化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洪文源編纂 2005 《澎湖縣政府府史》，澎湖：澎湖縣政府。

### 三、近人論著

- 西原大輔著，趙怡譯 2005 《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北京：中華書局。
- 李慶 2004 《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呂紹理 2005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政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
- 吳永華 2000 《臺灣歷史紀念物—日治時期臺灣史蹟名勝與天然紀念物的故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孟昭毅 1998 〈日本漢詩及其漢魂〉，《岱宗學刊》1998.3。
- 林會承 1994 〈澎湖聚落的形成與變遷·上〉，《文化與建築研究期刊》第4期。
- 林會承 1995 〈澎湖聚落的形成與變遷·下〉，《文化與建築研究期刊》第5期。
- 林會承 2000 〈澎湖風櫃尾荷蘭城堡—被遺忘的臺灣第一座西式城堡〉，《歷史月刊》第147期。
- 島田謹二 1995 《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
- 施懿琳 2006 〈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崁集》的臺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第15期。
- 高文漢 1998 《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海村惟一 2005 〈關於日本漢學（日本漢文學）的「中國性」：以《翰林五鳳集》的漢詩為例〉，《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徐麗霞 2005 〈劉家謀詩作的澎湖庶民圖象·上〉，《中國語文》第576期。
- 徐麗霞 2005 〈劉家謀詩作的澎湖庶民圖象·下〉，《中國語文》第577期。
- 張玉璜 1998 《媽宮（1604-1945）一個臺灣傳統城鎮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 陳速換 2003 《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
- 陳培豐 2006 《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
- 黃小平 1975 〈清代澎湖經營之研究〉，《大陸雜誌》第50卷第4期。

- 黃俊傑 2004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鄭毓瑜 2005 《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
- 廖炳惠 2002 〈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175 期。